

文章编号: 1674-5094(2013)02-0014-05  
中图分类号: C912

DOI: 10.3863/j.issn.1674-5094.2013.02.004  
文献标识码: A

# 流动与族性 ——文化变迁的视角\*

袁宝明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现代化过程促使社会个体流动,由于个体的社会流动,无论是垂直流动,抑或是水平流动,都促使族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流动中个体的族性分为显性文化要素、隐形文化要素两个层面,显性文化要素作为个体文化中的外显特征随着个体的流动发生了变迁,特别是作为现代生活指标的物质文化的变迁,彰显了文化变迁的统一性和普遍性;隐形文化要素作为民族文化中深层的、稳固的文化特质,是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原始记忆,是区别于我族和他族的标志,在流动的个体中不易发生变迁。

**关键词:** 个体流动; 现代性; 族性; 场域; 文化变迁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5.1240.G4.20130228.1016.005.html>

袁宝明. 流动与族性——文化变迁的视角[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5(2): 14-18.

## 引言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原先人们生活的社区是建立在情感、伦理、宗教等非理性因素基础之上的,是一种联系紧密的血缘集体,如氏族或村落、部落、土地拥有的大家族。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中,个体终生依赖集体,集体完全能够给个体带来必要的生存物质和现实的安全感,集体给予个体的是一种控制和庇护的功能。现今个体的社会生活正在转移到高度集中化和越来越城市化的国家集体里,伴随着这种现代社会的转型,那些单个的人,从他们成长开始就踏上了主动或是被动的流动之旅,也就会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原先较为紧密的、地域性的血缘群体,进而也就远离了群体的控制和庇护功能。在那些更加庞大、高度集中和不断城市化的国家社

会里,单个人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要依靠自己谋生立业,他们的流动性(在这个层次的地域和社会意义上讲)增加了<sup>[1]</sup>。由于庇护和控制功能的日渐丧失,原先群体自身的凝聚力也开始减弱,个体也就开始了积极主动的选择生存方式,个体自身的认同也开始了变化,随着个体流动到不同的场域,个体的族性也就开始发生了流变。下面以文化变迁的视角,运用布尔迪厄<sup>①</sup>的场域理论对流动到新场域中个体的族性流变提出理论思考。

## 1 流动的现代性

现代性涉及人口移动、技术、资本、科技和知识,以及符号意义的转移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中新技术正在创造出一个“全球时代”,在这个时代,地区与

\* 收稿日期: 2012-12-27 网络出版时间: 2013-02-28

作者简介: 袁宝明(1987-),男(汉族),甘肃定西人,硕士,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①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8.1-2002.1.23)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生前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布尔迪厄1930年出生于法国贝恩,他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他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开始探索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分析超越了传统的对立关系及二分法,超越了由此造成的视野的局限性之后,理论的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布尔迪厄觉得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建立一种对古典社会理论的批判。早在1972年布尔迪厄就已出版了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实践理论概要》,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198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这部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1990年,布尔迪厄80年代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座内容《反观社会学的邀请》则发表于1992年。布尔迪厄的国际性学术影响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上升的,进入90年代后非但势头未减,而且后劲十足。

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似乎再一次被戏剧性压缩了<sup>[2]</sup>。有些学者甚至主张让时间和空间“去物质化”,因为人员、机器、影像、信息、权力、金钱和危险全都处于一种“迁移”状态之中,他们以令人迷惑的速度驰往人们难以预见的方向:从此地到彼地,从此时到彼时<sup>[2]</sup>。各种各样的理论家们都试图理解这些不规则的变化,齐格蒙特·鲍曼在谈现代性时用“快速流动”来形容,认为现代性是为前现代世界所形塑的稳固性和定性化的一种反叛,现代性用强制的、义务性的社会地位自觉取代了社会地位的被觉,开启了流动的大门<sup>[3]</sup>。

在这种现代性思想指导下的现代化过程则加速了个体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个基本类型,分别指个人或社会价值变化的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位置是否有方向上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是水平流动,相反则是垂直流动<sup>[4]</sup>。现代化使社会个体成员对从前那种必须的和终其一生的对家庭、血缘群体、地域社团和其他这类集体组织的依附减少了,不管是社会个体的水平流动或是垂直流动,他们的行为、目标和理想都发生了变化,对原先集体组织的认同也减弱了。社会个体在获得生命的保护、物质分配、工作机会与福利和收益的保障方面,或者当需要做出决断时在获得帮助、建议和关心方面,对原先集体组织的依靠已愈益减少。起先只发生在有限的一些特殊群体内,后经上百年的历程逐渐扩展到更广大的阶层,甚至扩展到了乡村地区,扩展到了民族地区。

## 2 少数民族个体的社会流动

民族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加速了民族地区个体的社会流动,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对传统的生计方式造成了冲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商业化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本,溶解了亲属关系和先赋性建立起来的社会个体的发展网络。这些方式有可能使个体从其他类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增强了社会个体的独立性,即他们在经济再生产的同时也在培养着自己适应社会的实践理性。市场将不同的民族个体成员纳入了统一的竞争体系,为不同的社会个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民族不断打破封闭,由相互闭塞到逐渐交流,由彼此隔离到密切联系,各民族人口空前流动,民族散居化越来越广

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开启了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大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点,成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主要场域。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社会结构解构和重组,专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族个体成员参与到更大更广阔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接受新的职业、新的挑战,整个民族地区的社会流动性与社会活力也因此得到增强。

一旦少数民族个体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开始流动之旅,作为个体就会从那些较小的、联系密切的血缘和庇护集体中脱离出来,在面对现代的社会生活时,选择空前增多,自主性空前得到了加强,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同时也就把自己置于数量激增的各种不确定面前和无止境的流动中,流动中的个体穿梭于不同的社会场域之中,根据具体的社会情境改变生存策略,遵循现实生活的理性,这种生活理性能够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社会个体根据这种现实需要构建起来的文化体系也就完全不同于原先,族性也就发生了流变。

## 3 流动中个体族性的变迁

“族性”是个外来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本文中把族性看作“一套互动中族群间区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为我族与他族各依不同程度所确认”<sup>[5]</sup>。族性是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沉淀而形成的,就其整体内涵而言,指的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共同记忆以及象征符号,由此看出,族性同义于民族的历史文化<sup>[6]</sup>。本文将族性分为显性文化要素、隐形文化要素两个层面,是为了便于研究而建构的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文化的两个维度往往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文化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相当稳定的一体化体系,但是,当它所适应的环境或人类对这些生活环境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时,文化也会随之变化,因此文化变迁是一个必然的过程<sup>[7]</sup>。变迁在所有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尽管变迁的速度和表现的形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大不相同<sup>[8]</sup>,文化变迁的机制是创兴、传播、文化遗失和涵化。传播是文化变迁的主要推动力,拉策尔认为,单一文化要素趋向于传播到其他地方,而整体“文化复合体”则通过迁移扩散开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个体的流动增加了,人们在面对生活的选择时,常常会陷入先前的时代所基本或完全不知道的新的不确定状况。在这种流动的状况下,往往会引起个体所携带的文化特征的变化,显性文化作为个体文化中的外显特征随着个体的流动发生了变迁。隐形文化作为个体文化中深层的稳固的文化特质,是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原始记忆,是区别于我族和他族的标志,是文化世界多样性的体现。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在个体的流动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

### 3.1 新场域中的适应——显性文化的变迁

布尔迪厄将人们对外部世界内化的产物,将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成为“习惯”,而将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成为“场域”<sup>[9]</sup>。流动中的个体离开了原先生活的地域,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场域,而原先的模式、规范和准则,是他们在原有的场域中遵守的对象,使他们能够选择并作为稳定的确定方向的依据,是他们原有生活指引的准绳。流动的个体改变了生活环境,到了一个新的现代化的生活场景之后,原来的这些模式、规范和准则在新场域中所起的指导作用,现在正变得日益缺乏起来。新的场域不断雕琢着过去的习惯,使之脱胎换骨<sup>[10]</sup>,原先的模式和秩序正在被新的生活场域所解构,进而根据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生存规则来重构。特别是现代技术文化的扩张,流动中的个体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生存工具被接受和使用。享有自由的社会个体所面临的任务是,运用他们新的自由去寻找合适的位置,并根据服从的新原则,在新的生活环境或新的社会阶层中安定下来。在现处的那个社会位置和新的环境中,忠心地服从、遵守新的模式和原则,这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合适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所以,社会中的个体不管是水平迁移在不确定的生活环境中还是垂直的流向新的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都加速了族性的显性文化的变迁。

#### (1) 流动中个体族性的“脱域”——显性文化的解构

在过去,不同的大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行业和职业的人处在不同的世界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异质性<sup>[3]10-17</sup>,现今各个民族、各个阶级以及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个体之间在生活条件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我们正从一个前社会的“参照群体”时代慢慢的,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普遍参照”的时代。一个人经常表现特定的文化特征,往往是随着

具体的状况而定,流动中的民族个体文化特别是在吃、穿、住、行等方面越来越相似。例如,穿戴相同的服饰,曾经是一切民族共同体所有的表象特征,但在当代却出现梦幻般的变化,在所有的民族体共同的特征中,变迁最迅速的要数民族服饰了<sup>[11]</sup>。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各民族的成员纷纷走下高山,走出村寨,离开了族群文化的中心,进入乡镇,进入了城市。流动的规模扩大了,流动的频率增加了,在新的现代化的场域中消费的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在经过价格、色彩、款式等多方位的理性选择之后,那些简便、经济、美观、大方的服饰自然的为流动中的个体所接受。因此,今天多数少数民族个体,走出了相对封闭的传统的民族聚居区域,走出了原先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在同一个世界中流动,在同一个市场体系中竞争,听到的是相似的信息,看到的是相似的事情。

#### (2) 流动中个体文化的现代性适应——显性文化的重构

从文化流传的地域空间和接受的人群看,技术性文化不属于某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也不会限定在某一民族、国家和地区流传,而是属于许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并在广大的地域空间内流传和发生着作用。那些作为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正在普及到民族地区,特别是电视、网络、现代的交通工具,是流动中的少数民族个体在适应新场域、解决新问题的生存工具,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技术性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工具,能够满足少数民族个体的需要,能够在新的场域中给人们带来便利和实际效益,能够在新生活环境中更好的适应和生存,技术性文化作为生活的理性选择变成了显性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化文化给显性文化注入了活力,并重构了显性文化。

### 3.2 流动中个体身份的积极建构——隐形文化的强化

在现代社会中,当抽象财富的积累和拥有在界定社会位置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时,先赋性的族群性范畴就不像在裂变体系中那样直接建构社会秩序,社会位置不是族群性的、先赋的,而是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的,并且伴随着显性文化变迁而变迁,流动中的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明确。在这样的体系中,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决心来指引自己,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够自由地、胡乱地、随心所欲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模

式,或者说,这更不是意味着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和设计蓝图的时候,完全脱离原先的生存习惯和民族记忆。表面上看族性在构建社会结构的范畴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但是,它不能明确地与民族个体相分离,更重要是个体的族性在原先的生活场域中,已近被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固定下来,并且成为个体或族群的一种象征符号或民族记忆,特别是这种社会记忆和生活习惯在建构个体内心的秩序和自我认同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新场域塑造了新的习惯,促使了流动中个体的显性文化符号发生了变迁,同时旧的“习惯”在新的场域中发生着积极的作用,塑造着新场域的形成。在新场域中隐形文化要素对流动的个体构建生活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族群性或文化认同才凸显了出来。个体身份的积极建构,成为隐形文化强化的主要特征。

不同族性的个体身份认同都有自己的核心构成元素,它构成此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边界和差异,表现出独有而排他的特点。不同族性的核心元素构成了不同族群行动逻辑的文化空间,它是该族性的边界与底线,体现着不同群体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差别。尽管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有可能时常冲击着这一底线,但总体而言,人们的行为最终会回到底线所框定的范围之内。而核心构成元素形成的边界与底线之外的空间,就是文化为求得在当下情境之中生存与发展变迁的空间<sup>[12]</sup>。族群认同,既不是由个体终生所携带,也不是可自由随意选择的,这是因为它是相互的、关系性的构建,随着流动个体的不同场域变化,认同是由个人在更大的族群关系网络的场域中的位置所决定的。流动并不会轻易改变这个现实,反而在与不同族群的交往过程中会得到强化。在地理空间上从A流到B,或是从一个既定的社会位置流到另一个既定的社会位置,个体原先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不会轻易流变,在多元族群的现代化新的场域中,通过相互了解,进而相互交往,反而会强化。当流动中个体遇到新的挑战 and 困惑时,原来的生活记忆会指导现实中的行为方式,流动中的个体会寻找自己的“根”,积极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流动中的个体会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在流动的现代化中,“族性”会得到进一步的张扬,文化中的核心元素不会随着流动而变迁。

流动中个体族性的显性文化符号的变迁,是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发生改变时,个

体通过积极主动、理性的实践活动,是对现代性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主动的认同,这种文化的变迁动力和根源是适应新场域的一种生活理性的选择。当面对新的生存空间时,社会个体会积极地适应新的环境,加之与不同群体的长时间互动,个体会主动或被动的将自身置于环境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性接受不同族群文化符号,借鉴和吸收新场域中现代性文化的要素,进而改变自己显性的文化特征适应新场域,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传播在个体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隐形文化要素的强化,说明文化的核心元素不会随着流动而变迁,证明了现代化的过程不是文化的同质化,多元并存的多样性才是发展的永恒主题。

## 4 结 语

本文运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以流动中个体文化为考察对象,对流动中个体族性变迁提出了理论思考。场域和习惯的关系很简单:场域制约着习惯,习惯又不断地建构着场域,习惯有助于把场域合成有意义的多样性世界,而不是单纯的受制于场域<sup>[9]</sup>。社会个体流动到新的场域中,日常生活实践的改变促使个体在生活理性的指导下适应新的生活,在这种多元族群、多文化并存的现代性的场域中,显性文化在解构的同时也注入了现代性的要素,发生了变迁,但是这种文化的变迁并不代表族性的完全解构,因为,在这种文化交流与融合场域中,族性中隐性文化元素得到了积极的强化,族性得到了张扬。因此,现代化过程中,流动个体的族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伴随着个体在不同场域中的流动过程,族性中不同层次的文化要素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

## 参考文献:

- [1] 埃利亚斯. 个体的社会[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39-140.
- [2] 约翰·厄里. 全球复杂性[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
- [3] 鲍曼. 流动的现代化[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4] 王甫勤. 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综述[J]. 兰州学刊, 2008(8): 203-205.
- [5] 庄英章. 文化人类学: 下册[M]. 台北: 空中大学印行, 1992: 325.
- [6] 原晶晶. 当代民族主义视角下的民族、族性与民族国

- 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19-23.
- [7] 马广海. 文化人类学[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398.
- [8] 克莱德·伍兹. 文化变迁[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22.
- [9] 陈宇光. 论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J].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2003(4): 43-46.
- [10] 朱炳祥. 社会人类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259.
- [11] 李甫春、赵明龙.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变迁[M]. 成都: 民族出版社, 2010: 61.
- [12] 王贤全. 云南新平漠沙镇花腰傣服饰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几点思考[EB/OL]. (2010-11-12) [2012-11-15]. [http://www. sky. yn. gov. cn/ztzl/yq30zn/zg-wj/mzwx/7975386175771933781](http://www.sky.yn.gov.cn/ztzl/yq30zn/zg-wj/mzwx/7975386175771933781).

## Mobility and Ethnic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s

YUAN Bao-M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ccelerates the individual mobility in society. Due to the individual's social mobility, whether vertical flow or horizontal flow results in ethnicity changes of different degree. Flowing individual ethnicity involves dominant cultural factors and recessive ones. The explicit outer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culture, the dominant cultural factors, change along with individual mobility. Such changes, especially the change of material culture, known as modern life index, display the unity and universality of culture change. Recessive culture elements, the strong cultural traits of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memory of national mentality, and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do not change easily in th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Key words:** individual mobility; modernity; ethnicity; fields; cultural changes

(编辑: 钟青)